

移民社群整合与新加坡女子教育之发展

汤 锋 旺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潮风起云涌之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掀起的女学运动亦蔚为壮观。与中国不同,移民时代新加坡女子教育之发展呈现出浓厚的社群属性,它具有灌输政治意识、促进华人社会发展等社群整合功能。在办学机制方面,新加坡华人社会则依托社群力量筹措经费和召集师生,加以制度化的管理,从而推动女子教育发展。华人社群与女子教育的紧密关联,亦表明女子教育发展对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家庭、教育、经济、政治等方面具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新加坡;社群整合;新加坡华人;女子教育

中图分类号:D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4)01-0071-05

作者简介:汤锋旺(1985—),男,福建福安人,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主要从事新加坡研究。

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华人社会衍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 世纪前半期南洋华侨教育便是中国教育体制的海外延伸。然而,在南洋华侨教育体系内,华人女子教育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而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视角来谈,通过兴办女学来强调女性的教育主体身份,有助于建构华人的社群意识,进而达至凝聚社群之目的。

从新马学术界来看,郑良树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中,厘清新马华文教育发展脉络的同时,梳理了新加坡华文女子教育发展的史实^{[1]194}。李元瑾则在研究海峡华人知识分子在东西方文化之取向时,关注海峡华人知识分子在女权与女学思想^{[2]257-258}。国内学界亦有涉及移民时代新加坡女子教育之研究。周聿峨在《东南亚华文教育》中叙述了新加坡女子教育发展情况^{[3]49-50}。范若兰从社会性别视角对新马地区女子教育进行研究,分析了战前新马华侨女子教育的发展状况,指出新马华文教育性别差异的根源^[4]。

大体而言,学界对移民时代新加坡女子教育的

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对于新加坡华人社会创办女子教育的内在机制及其在社会层面上所具有的社群功能重视不够。探究华人社会创建女子教育的机制及其社群整合功能,须从当时华人女校的具体运作入手,以透视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社会女子教育发展之动力因素,进一步认知女子教育对新加坡华人社会内部社群整合之意义。

一、新加坡早期华人女子教育发展概况

在 1837 年新加坡书院成立时,院中就有女子班,为各族女童提供小学程度的教育。后新加坡书院小学部发展为莱佛士男校,女子班即发展为莱佛士女校^{[1]246}。莱佛士书院向华人女子开放,与莱佛士对新加坡的设想有关。他认为书院创立目的在于教育上层人民的子女、为殖民地培养所需人才、收集有关文献、服务殖民制度等方面^[5]。尽管莱佛士书院名义上是向新加坡各族群开放,实际上是为殖民当局统治服务,且只有少数华人子女可以进入该书院学习。

此外,宗教团体积极推动早期新加坡女子的

收稿日期:2013-05-03

发展。1843年,伦敦布道会所属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派格兰特女士前往新加坡,前任的戴尔夫人已经开办了一所华人女子寄宿学校,学生大致有20多名,增长势头良好^[6]。由于中国此时开放通商口岸,促使中国人携妻带子前往新加坡,伦敦布道会对该校发展前景充满期待。格兰特小姐任内,该校向华人女学生提供初级英语教育,并传授宗教知识。1853年,苏菲亚柯克小姐接替格兰特小姐管理学校,但学生人数只有20个^[7]。该校向许多华人女孤儿提供庇护,并专门为走读生成立分校,被称为“贫民学校”。到19世纪90年代,学校管理权从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转移到英国支那传教会。此后,学校状况已不尽如人意,被迫关闭。

法国罗马天主教会于1854年创建圣婴女子学校。它由玛蒂德尔小姐和她的三位同行开办。她们将传教与教育结合起来,并取得不错的成效。这所女校面向新加坡各族群,以法语为教学用语。葡萄牙罗马天主教会于1879年在一所小房子内开办了圣安东尼女校,第二年搬到维多利亚街教堂旁边的一所复式房里,该校学生主要是葡萄牙裔女童,采用英文为教学用语^[8]。美国卫理公会步其后尘东来。在新加坡建立传道据点不到三年,索菲亚·布莱克摩小姐便在1887年创建了美以美女校,最先该校学生以泰米尔人和印度人为主。1888年,布莱克摩小姐又创办了菲尔德卫理公会女校,该校作为她在直落亚逸街华人社会活动的据点,学生以华人为主^[9]。

早期新加坡华人女子教育的主要办学力量来自西方各国的传道会。这些女校以传播宗教为主要目的,教学语言是西文,学习的主要内容为宗教知识。在这种宗教教育中,华人女子所学到的知识少之又少。虽然它们后来大都接受英殖民当局的津贴,但办学经费仍然捉襟见肘^[10]。尽管女子教育发端较早,然接受教会女子教育的华人非常少。一份1899年新加坡英文女校统计显示,上述各校华人学生人数总计39名,印度人有15名,马来人因为宗教原因不愿意接受基督教教育,因此女校学生近百分之九十都是欧洲人和欧亚混血儿^[11]。

19世纪后半期,华人社会规模不断扩大,华人在航运、树胶等领域都展现出不可忽视的力量。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华人对自己子女教育问题更加重视,女子教育问题被视为重要一环。华人社会对海峡华人妇女的言行举止感到担忧。娘惹被视为华人社会重要问题。因为她们沉溺于赌博、迷信且愚昧。正所谓“南洋闺教素不堪言,女子之居是邦者几不知柔顺为何如,德贞节为何如事,此其素鲜启迪,唯视

其诸姑姨姊之所为,以至于习日乖”^[12]。华人社会已经认识到教育本族群女子的重要性。林文庆指出:“我们的妻子将是子女们的母亲,她们掌握着塑造我们民族命运的力量。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善待她们,授之以礼,给予接受体育和智育的同等机会。”^[13]从必要性和重要性来谈,都应该改善海峡华人女子的生存状况。

对于如何彻底改变海峡华人妇女风貌,华社认为,只有通过良好的教育,让妇女们感受社会生活之愉快,引导她们形成优雅高尚的言谈举止,才能最终改善本族群的社会状况^[14]。1899年,林文庆、宋旺相等积极筹划,成立了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由于民智未开,办学过程阻扰颇多^[15],给予支持的人并不多。当邱菽园捐献三千元给该校时,宋旺相赞誉之情即溢于言表。由于该校为海峡华人社群所创办,学生以海峡华人女生为主,大量新客移民子女未受到重视。1909年,学校创办十周年时学生人数还未过百,且被殖民政府警告要求改善学校条件。学校的发展并不顺利。

进入20世纪,新加坡女子教育发展一扫颓势。中华女校、崇福女校、南华女校、南洋女校、静方女学校等一批女校相继成立。之所以形成兴办女学的热潮与当时中国有很大关系。晚清政府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以后已经着手教育方面的改革。1903年,晚清政府颁布的修订学堂章程便将女子教育囊括其中。“民国肇造以后,政府以侨胞贡献革命甚大,而重视侨教,侨社兴学之风更形蓬勃,加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影响,更促进各地侨教之发展”^[16]。新加坡华人社会发展女子教育的意识亦渐趋觉醒。

二、新加坡华人女子教育的创建机制

从新加坡华人女子教育发展的脉络来看,女子教育发展与华人社会发展相同步。华人社会人口规模、经济力量以及文化觉醒等方面的成长,促使华人女子教育之兴办主体逐渐从政府、教会转移到华社肩上。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为女子教育构建完整、规范管理体系奠定了基础。

从办学经费来看,女校经费来源主要包括学费、月捐、特别捐等方面。一般而言,学费收入较为固定,在女校经费结构中占有重要位置。静方女学校收支记录显示,学费在整个收入结构当中的比例相当高且较稳定^[17]。这一点亦在南洋女子中学校收支表中得到验证。当学校运作过程中资金来源恶化时,董事会通常会考虑增加学费来弥补经费的不足^[18]。除学费外,年捐、月捐和特别捐亦是女校经费的重要来源。来自华商的捐赠对女校至关重要。

1916年南侨女学的开办费芳名录显示,陈翼扶、黄云辉、古荫南、梁谷勋等客籍华商所捐之金额^[19]。同时创办的崇福女校则在福建会馆监学王会议倡议下创办,由福建会馆资助。其中,福建籍华商对崇福女校的捐赠自不可免。1928年由广惠肇三属同人所创办的静方女校,其月捐、年捐或特别捐的主体为三属华商或商号^{[20]1}。这些事实有力说明了华商对女校的经济支持有明显的社群边界。

移民时代新加坡华文女校的经费状况整体上较为紧张。在经常性收入无法满足或遭遇突发情况时,华校当局采取灵活方式获取经费,包括演剧筹款会、游艺会、成绩展览会等。其中,演剧筹款会最为突出。学校连续演剧,实为南洋学界之创举^{[21]13}。几乎所有女校都有举行过演剧筹款会。当女校因购置校舍,或因经济萧条,抑或是教务发展遭遇经济困难时,演剧筹款被视为有效途径。演剧筹款会之前,董事会内部事前会通过成立筹备会,推举正总理、财政员、查账员、庶务员等相关人员推进^[22]。而后,筹备委员会起草演剧筹款宣言,向华社散发传单,售票员挨家挨户沿门售票。各商家则鼎力支持演剧筹款所需物品,提供会场所需之糖果、汽水、香烟等^[23]。尽管过去人们曾对女学生演剧多所指责,“但到30年代,人们对女学生为筹学校经费而演剧已视为平常事”^[24]。

此外,女校还通过开展展览会来募集经费。展览会召开时,学校就会将学生优秀作品出售给民众,以获得微薄收入。这种兴教之举亦得到了学生支持。30年代,新加坡女校普遍遭遇经济困难。中华女校校友会为维持母校发展宣告成立并积极募捐款项。南华女校为了“打倒债台”而召开同人大会议寻求解决之道。女校方面亦鼓励华社的义举,如静方女学校在1938年筹建校舍时规定:凡捐款五千元以上者,以本校大礼堂纪念捐款人,或被指定之某人,并悬其廿四寸相片于校内;凡捐款二千元以上者,以本校图书馆纪念捐款人;凡捐款一千元以上者,以本校教室一所纪念捐款人,并悬其廿四寸相片于校内^[25]。无论是演剧筹款会、游艺会、展览会,还是女校为缓解经济困境所采取之举措,其根本在于动员华社力量以促进华人女子教育发展。

其次,师资与招生亦是华社兴办女子教育的重要内容。战前的新加坡,教育水平不高,不得不从中国聘请教师。当时由于社交活动范围不大,加上存在籍贯观念,广东人办的学校多从广州请教师。福建人的学校则从厦门请教师,潮州人也循例从汕头请他们的乡亲来办学^[26]。女校自身不断发展,对师

资的需要不断增加。在本地无法提供充足师资的情况下,女校大都从中国聘请教师。1936年静方女学校教职员一览表显示,该校百分之七十的教职员属广东籍^{[20]3-5}。而一些跨帮合作的女校情况则略有改观。1935年南洋女校23名教职员当中只有7位福建籍^{[27]129}。教师社群属性构成与女校之社群属性大体一致,但这种局面在不断改善当中,教职员招聘对专业能力的要求日趋重视。以招聘校长为例,新加坡华人女校大都从中国招聘而来,并且具有从事女子教育工作的专业背景。南洋女校首任校长余佩皋、静方女校校长陈如葆、南华女校第一任校长吴木兰等人即如此。至于普通教师,女校发展初期的师资亦来自中国,而随着各女校师范科的创设,女校教师教育背景发生了悄然变化,女校教师当中本地师资的比例不断上升,显示出移民时代的新加坡女子教育本土化趋势的加强。

女校生源方面,亦显示出浓厚的帮群色彩。根据静方女学校1936年学生籍贯表的分析,该校广东籍的学生人数有198名,福建籍的学生人数有50名,江西籍的学生则有1名^{[20]3-4}。虽然各女校都宣称并“无畛域之分”,事实上女校学生的人数构成还是明显看出该校之社群所属。南洋女子中学1935年的在校学生籍贯表亦反映出该校福建籍学生占多数的事实。在376名学生中,福建籍学生有211名,占了百分之五十六之多^{[27]145}。从招生方式看,各校一般会在报刊上登出招生广告和招生简章。对入学资格、试验科目、试验日期和入学日期等方面进行限定^[28]。由于办学经费主要依靠学费,学生数量与办学经费多少关系甚大。女校在生源方面囿于华社帮群结构,其社群属性往往决定了学生社群属性的构成。

复次,在殖民地背景下创办女子教育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如何有效管理女校。这可从当时女校规章制度和行政结构窥见一二。女校的组织结构由董事部和教务部组成。各校通过董事部章程对董事部的组成、选举办法、选举资格、董事会成员权责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从董事会组成来看,新加坡华文女校的董事一般来自该校所属之社群。1935年南洋女子中学校董一览表中,二十一名董事成员中,只有林文田一人属广东籍^{[27]128};1930年至1936年,静方女学校董事部职员一览表亦显示该校董事会成员大都属广东籍^{[20]1-3}。作为跨帮兴办女学的南华女校,其董事会成员则显示出多元性特点。南华女校董事除了广府人和福建人外,客属人士在这当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29]。但是,跨帮合作也意味着南华女校

内部纠纷的参杂。1932年,南华女校陷入内部纠纷当中,最终诉诸同人大会议,欲求解决董事会内部纠纷,但收效甚微。由此观之,华社内部的整合与冲突对女校董事会运作有很大的影响。教务部作为执行机构,是构成女校管理的重要方面,它由校长负责。校长由董事聘请并负责日常行政事务,董事部专心负责经费事务,两者分工合作,依序进展。教务部下设教务会议,分设教务课、训育课、事务课三部分,各课由各个负责具体事务的股组成^[30]。各部门依据所规定的规章制度来推进校务发展。

概言之,制度化与社群化是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社会整合的重要方式,女子教育发展亦通过社群化与制度化的方式推进。一方面,华文女校在经费来源、师资与学生、学校管理等方面具有明显社群属性;另一方面,华文女校的运作和管理又基于一整套规章制度基础之上。尽管华人社会固有的社群观念在某些方面不利于华文女校发展的制度化,但是,社群化和制度化仍是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华文女校发展的两大推动力。

三、新加坡华人女子教育的社群功能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学校教育是社会整合系统当中的重要环节。反过来,发展教育对促进社群整合亦具有积极的作用。同理,新加坡女子教育的发展对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社群整合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女子教育的发展不仅为此时华人社会培养了众多人才,也促进了华人女性政治意识的觉醒,最终促进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凝聚与整合。

第一,女子教育的发展为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社会培养了人才,推动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从培养宗旨来看,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女子教育的立足点曾经历了从家庭向社会和国家转变的过程。在民国创立以前,新加坡华人社会对女子教育的看法基本上与中国一致。华社认为,中国女子教育落后于西方,这是造成中国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尽管华人社会开始认识到东西方女子教育存在的差距,但是,此时华人社会更多地是把女子教育与“相夫教子”联系在一块。女子学校的课程就包括女工、烹饪等,并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标。

这种情况直至民国创建后才开始改观。女子作为国民一分子被赋予更多的国家和社会义务,正所谓“女子为国民之母,女学为母教之源”^[31]。各女校在章程宗旨的规定上也将培养良好国民列为重要目标。从课程设置来看,女校课程与男校一样,也设置了公民课程,冀图培养女生的国民意识。女校的发展更加多元,为华社培养的人才不再囿于家庭需要,

一些师范、艺术、体育等方面的专门性人才开始涌现。在师范教育方面,华文女校的贡献则是有目共睹的。在1911年中华女校便附设师范班。1917年,南华女校也附设师范班。1928年,静方女校成立时也兼办师范部^[32]。这在女校历届毕业生名录当中可得窥见一斑,历届师范班学生的去向表明女校在新加坡整个华文教育发展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体育、艺术人才方面,南洋女子体育专门学校除了培养华人女子体育人才外,为造就艺术人才起见,还于1931年增设了艺术科^[33]。另外,女校亦非常重视女子职业教育。有女校的董事会指出:“女子体育固当积极鼓吹,而妇女职业尤当酌为提倡。盖当此经济竞争之时代。无论男女,均应有稳当职业,以便独立生存”^[34]。由此观之,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女子教育的发展既是新加坡华人社会演变的产物,亦对华人社会的家庭、教育、经济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女子教育对华人社会整合的作用,还体现在它促进了新加坡华人女性的政治觉醒。这主要体现在女校的政治认同方面。移民时代新加坡华文女校具有强烈的中国认同。女校不仅在教学内容上传播中华文化,而且在学校秩序上显示出对中国认同。当女校举行毕业礼、开学礼或其他活动时,其秩序当中的重要环节就包括向国旗行礼、唱国歌^[35]。这与女校的培养宗旨一致。南洋女子学校1935年校历显示,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总理逝世纪念日、革命先烈殉国纪念日、革命政府成立纪念日、国民革命誓师纪念日、孔诞纪念日、国庆纪念日、总理诞辰纪念日是该校的重要节日^{[27]131}。一般而言,重要节日时女校都会举行庆祝活动。此外,女校还积极参与华人社会的政治活动。1931年,南华女生帮助筹赈会热心售票,筹赈会认为该校筹赈成绩卓著,实堪嘉许。1938年,新加坡南华女中、崇福女中、中华女中、静方女中、南洋女中皆热心报效祖国,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筹得了不少的赈款^{[24]281}。通过教学活动和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女校对中国的认同亦有所增强,这对唤醒当时女性的政治意识是有裨益的。

综观上述,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女子教育既是华人社会整合的产物,又是华人社会整合的推动力。华人社会透过社群化与制度化的方式来为女子教育发展提供动力;女子教育的发展反过来也推动了华人社会的整合。女子教育培养目标从家庭层面转向社会层面,华人女性参与到华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当中去,这对于华人社会的整合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新加坡华人社会创办女

子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华人社会凝聚华社力量、实现 的视角来谈,女子教育发展除了社会性别意义外,对
华人社会整合的历史过程。从新加坡华人社会发展 华人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 [1]郑良树. 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册[M]. 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1998:194.
- [2]李元瑾. 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M]. 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57—258.
- [3]周聿峨. 南亚华文教育[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49—50.
- [4]范若兰. 战前新马华侨女子教育的发展[J]. 东南亚研究,2004(2);范若兰. 性别与教育:战前新马华文教育的性别分析[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4).
- [5]A Century of Education in Singapore[N].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1935-10-08.
- [6]Female Agency Among the Heathen. As Recorded in the History and Correspondence of 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M]. London:E. Suter,1850:210.
- [7]宋旺相. 新加坡华人百年史[M]. 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72.
- [8]W. Makepeace,G. E. Brooke,R. S. J. Braddel. 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being some account of the capital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from its foundation by Sir Stamford Raffles on the 6th February 1819 to the 6th February 1919[C]. London:John Murray,1921:456.
- [9]Lim, Lena U Wen, Evita Lee, Chang Shook Leng. Memories, gems and sentiments; 100 Years of Methodist Girls' School[C]. Singapore: Methodist Girls' School, 1987:2—3.
- [10]Tan Yap K, Hong K Chow, Christine C. M. Goh. Examinations in Singapore: Change and Continuity (1891—2007) [M].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8:8.
- [11]Wilkinson, R. J. Annual education report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99 [M].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0:143.
- [12]女学说[N]. 叻报, 1888-06-25.
- [13]李元瑾. 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M]. 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0:66.
- [14]“Nyonyas” of Singapore [N]. The Straits Times, 1904-01-23.
- [15]Liu, Gretchen. Singapore: A Pictorial History 1819—2000 [M]. Singapore: Archipelago Press, 1999:169.
- [16]朱敬先. 华侨教育[M]. 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1:18.
- [17]静方女学校. 新加坡静方学校校刊:第一期[M]. 新加坡:静方女学校,1930:9.
- [18]华侨女学校启事[N]. 叻报, 1923-05-05.
- [19]南侨女学不日成立之可喜[N]. 叻报, 1916-03-01.
- [20]静方女学校. 静方女学校八周年纪念特刊[M]. 新加坡:静方女学校,1936:1.
- [21]方修. 马华新文学大系:八[M]. 新加坡:世界书局,1972:13.
- [22]南华、南强两学校敦请临时白话剧社演剧筹款启事[N]. 叻报, 1918-01-21.
- [23]南洋女学校第一次师生演剧筹款宣言[N]. 叻报, 1922-04-03.
- [24]范若兰. 移民、性别与华人社会:马来亚华人妇女研究[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150.
- [25]静方女学校. 星洲静方女学校筹款建校及概况特刊[M]. 新加坡:静方女学校,1938:1.
- [26]区如柏. 百年树人[M]. 新加坡:胜友书局,1992:77.
- [27]南洋女子中学校. 星加坡南洋女子中学校刊[M]. 新加坡:南洋女中,1936:129.
- [28]南洋女学校招生广告[N]. 叻报, 1923-08-09.
- [29]黄贤强. 新加坡客家文化与社群[M]. 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8:23.
- [30]崇福女学卅三周年校庆纪念恳亲晚会特刊[N]. 南洋商报,1948-04-16.
- [31]南洋女学五周年纪念师生演讲录[N]. 叻报, 1922-04-03.
- [32]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 华侨教育:第二辑. 广州:暨南大学,1984:162.
- [33]南洋女子体育学校扩大组织增设艺术科[N]. 叻报, 1931-12-24.
- [34]女子体育专校组织演剧筹款会[N]. 叻报, 1930-03-06.
- [35]南洋女学校举行师范毕业礼[N]. 叻报, 1922-12-21.

[责任编辑 孙景峰]